

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

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

赵巧艳 著

Spatial Practice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 Symbolic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Dong Nationality

民族出版社

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资助出版

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

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

赵巧艳 著 民族出版社

Spatial Practice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 Symbolic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Dong Nation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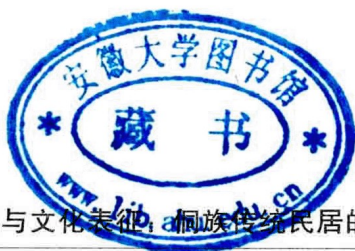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 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赵巧艳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105 - 13329 - 1

I. 空… II. ①赵… III. ①侗族—民居—象征人类学—研究—中国
IV. ①TU24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2689 号



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 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宝贵敏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750 千字

印 张: 34.25

定 价: 89.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329 - 1/T · 42 (汉 1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 - 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序 一

人类从游徙到定居、从居住天然洞穴到居住人造房屋，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人造房屋作为物质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彩，五彩缤纷。各民族、各族群均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想象力来构建自己的美好家园。

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富有建筑智慧的民族之一，其建造的鼓楼与风雨桥享誉中外。侗族的传统民居也颇具特色，其建筑特点主要继承了古代百越民居的风格和内涵，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学术界研究侗族传统民居的成果不少，但从人类学视角研究的不多。赵巧艳的博士论文《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是从人类学角度专门研究侗族传统民居的著作，这是一篇用力甚勤的优秀论文，曾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被评为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度优秀博士论文。

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认识文化，即认识和理解自己或他人的文化，也就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费孝通曾说：“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①虽然天天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和文化中，但许多侗族居民并不真正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民居文化和民居中蕴含的社会意义，尤其是深层次的文化结构、思维模式和象征意义等更是知之甚少，对于他人的社会和文化就更不用说了。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二是解释文化，也就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侗族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民居文化？侗族民居的空间结构和各种梁、柱分别象征什么？侗族民居文化与中原汉人地区的风水信仰和阴阳五行观念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读了此书，不仅把我们带入了象征之林，还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赵巧艳博士以细腻的笔触，细致的田野资料，敏锐的学术视角，借鉴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对侗族传统民居背后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民族志式的深描，把侗族传统民居研究

①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载《读书》，1998年第11期。

纳入了更为广阔而细微，也更艰难而深邃的境地。要从这篇论文向前，需要有更深厚的学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篇论文在许多方面已经跨越了前人的研究。赵巧艳博士严谨治学的态度是可取的，对自己研究对象的近距离感，得益于她的个人经历与田野经验。

考察、解析侗族传统民居文化，不能孤立、割裂，必须得联系侗族传统文化的整体，阐发才能臻于全面，也才能突出点的价值。赵巧艳博士正是这样，研究过程中，她除了对核心田野点——宝赠进行了长时间的驻地调查以外，还通过多种机会对其他侗族聚居区如湖南通道、广西三江、贵州榕江、黎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审慎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是属于田野点独有的还是侗族共通性的观点或结论。也正是通过预先设定的反复性定点或多点的长时段田野研究，借助研究方法的创新提高了研究结论的适应性和普适性。

总的来说，赵巧艳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13年6月我作为答辩主席首先阅读了该文，她吸取了答辩委员和同行评阅专家有益的意见，使之更加成熟。这部著作不仅可使读者认识侗族传统民居的空间结构和象征体系，而且还可以了解古代西南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文化交融情况。

二〇一四年四月六日

序 二

象征是一个古老而有趣的哲学命题，起源于现代人遥不可及的远古蛮荒时代，诞生于世界所有古老民族的神话传说之中，蕴含于许多宗教的抽象教义里面，其本质是将“抽象的感觉诉诸感性，将真正的生活转化为有意义的意象”（诺思洛普·弗莱语）。象征文化源远流长，在文字尚未发明、语言尚不成熟的原始文化阶段，象征还是行之有效的交流手段，拓展了人类思维的想象空间。它着眼于情感抒发、心灵体验和内心震撼，隐含于浩如烟海的文学艺术作品和传统文化之中，嵌入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潜意识里面，成为联系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的纽带。象征文化不仅是各种意象、情景、事件、典故的集合，也蕴含着历史和现实的深邃内涵，而且极具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重要的研究价值。对神秘而丰富的象征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将加深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更有助于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象征思维的民族，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人，无论是在原始文化如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或陶器的形制及图案、通过各种方式保留下来的原始诗歌中，还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乡村生活中，人们相当普遍地习惯于藉由象征方式来表情达意。在中国人的语言、神话、文学、艺术、民俗、礼仪、信仰、巫术等领域中，无不蕴含着特定的象征意义。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之“神秘文化”部分，其“神秘”之处，实在说来，有许多就是指的那些不被今人所理解的原初意象与符号象征。

对象征开始加以注意和研究，是相当晚近的事，大约肇始于18世纪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到19世纪的民族志研究者们，才把象征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加以重视，如诺瓦利斯（Novalis）对巫术语言的研究，利希腾伯克（Lichtenberg）对梦幻的象征研究，以及古典学家们对希腊神话的重新解释等。现代人类学家把象征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埃米尔·迪尔

凯姆 (Emile Durkheim)、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及其后继者卡尔·荣格 (Carl Jung) 等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研究过象征。20 世纪文化人类学在象征的研究上时起时伏。曾经一度因注重社会事实的田野考察与记述而对象征的研究有所削弱, 却又在晚近新的理论架构的调整中, 从侧重社会研究到偏重文化研究的转型使得象征研究再次受到人类学家们的关注。这种对象征和意义的重视, 超越了民族志的单纯记述和田野表述, 因而促进了对方法论的反省和批判。现有的理论成果和方法探索, 都是我们应该借鉴和参考的, 我们不能对世界闭目塞听、自以为是; 但在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之后, 摆在我们面前的更重要的事情, 是全面搜集我们自己民族的象征资料, 包括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古籍文献资料, 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梳理, 使其系统化, 并进行科学合理的阐释, 从而深化我们的传统文化研究, 为我们未来的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 包括侗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如此丰富多样的文化象征, 直到 1980 年代之前, 国内学术界却鲜有学者系统的专门研究; 换言之, 象征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一直是一个涉猎不多的领域。直到 1987 年 9 月刘锡诚筹划编辑《中国象征词典》时, 到 1991 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关于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象征, 我们所能看到的, 只有 20 世纪以来国外出版的寥寥几本由外国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汉学家们撰写的以汇集和阐释中国文化象征为主要内容的专著, 如 1950 年代在莫斯科出版的俄国汉学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Konstantin Stanislavski) 的《中国民间年画》和 1980 年代在科隆出版的德国汉学家沃尔夫拉姆·爱伯哈德 (Wolfram Eberhard) 的《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以及日本学者所写的有关文章, 如伊藤清司的《眼睛的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研究》等。1980 年代以后, 国内象征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 一系列译著如保罗·里克尔 (Paul Ricoeur) 的《恶的象征》、荣格的《人类及其象征》、茨维坦·托多罗夫 (Tzvetan Todorov) 的《象征理论》、让·波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的《象征交换与死亡》、恩斯特·贡布里希 (Ernst Gombrich) 的《象征的图像》、杰克·特里锡德 (Jack Tresidder) 的《象征之旅》、戴维·方坦纳 (David Fontana) 的《象征世界的语言》、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和菲利普·威尔金森 (Miranda Bruce-Mitford and Philip Wilkinson) 的《符号与象征: 图解世界的秘密》、玛莉安娜·波伊谢特的《植物的象征》、阿诺德·范·根内普 (Arnold Van Gennep) 的《过渡礼仪》、维克多·特纳 (Victor Turner) 的《象征之林》、《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戏剧、场景及隐喻: 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和《庆典》相继翻译出版, 从而为国内的象征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范本。同时, 利用国外的象征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的文化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国内的象征人

类学研究在深入理解国外的理论体系及研究进展之后，在理论应用的本土化和微观化两方面都取得了广泛而深入的进展，而且分别涵盖了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两大领域，但更微观、系统、专门、民族志式的研究著作还是显得不够。赵巧艳这部有关侗族传统民居文化象征的研究著作，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中国建筑象征研究和象征研究领域里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以侗族传统民居的文化阐释为切入点，选择侗族传统民居从建造到使用全过程所隐含的象征表达作为研究内容，采用象征人类学研究范式与分析框架，通过对核心田野点——广西桂林市龙胜县乐江乡宝赠村的深入调查，以及其他侗族聚居区的广泛考察，分别从建造仪式、空间格局、象征符号、象征秩序和观念意象等多个层面，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侗族传统民居表征空间形成的实践脉络，以及民居空间意义的表征方式，并在最后反思了现代背景下侗族民居空间文化表征的演化趋势与重构价值。无论在我国象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深入研究和阐发住居文化方面，都有着不可等闲的意义。她为了做好这一课题，作出新意，前后三年深入核心田野点——宝赠村，拜兰佳余和吴永能师傅为师，敬听他们传授秘诀和阐释文化，学习并掌握了珍贵的第一手田野资料。她广泛运用当代象征人类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力求梳理来源各异、纷繁复杂的象征表象，考辨其内隐的真实意义，使其系统化和序列化。作者在梳理、考辨和论证时，广泛运用了文化人类学行之有效的比较研究法，从那些在文化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地缘上与之毗邻而居而又传统悠久的汉族文化以及在东方文化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佛、释、道教文化等多层面比较中，剥离出哪些属于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哪些属于本民族原生的核心象征，哪些属于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从而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揭开了侗族传统民居象征扑朔迷离的面纱，开掘出侗族传统民居文化在仪式、结构、符号、观念等方面的象征内涵，探寻在象征表象掩盖下的深刻象征意义，即作者概括的自然观、空间观、时间观、宗教观、阶序观、伦理观、生育观、幸福观等观念象征体系。在许多问题的探讨和考辨上，作者的眼界是开阔的，见解是独到的，跳出了人云亦云的窠臼。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作者的研究成果，至少在侗族传统民居和象征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应是具有前沿性的。因此也就值得向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从事侗族传统文化研究、有志于从事住居文化研究和文化象征研究的同行和读者推荐。

从象征人类学的整体进展来衡量，作者对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研究，既有静态的研究，也有动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易于把不同来源、不同形态而又处于同一层面的材料聚拢来加以归纳和比较。静态的研究能够深入到常人容易忽略的领域，如作者在第三章建造仪式与象征表达、第四章家屋格局与象征蕴义、第五章民居建筑与符号象征、第六章二元对立与秩序象征所作的探讨。但静态的研究也存在着天

然的缺憾，不像动态的研究那样易于揭示出某种象征所以形成及其与一定生存环境的关系。作者不满足于静态的描述和阐发，因此在余论部分又详细地阐述了侗族传统民居在现代语境下的生存发展现状，沿着研究对象的演变脉络，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与存在价值。具体来说，作者结合宝赠侗族民居的内外部环境变迁特点与趋势，剖析环境变迁对宝赠侗族传统民居象征意涵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及其特征体现，并反思新的语境下侗族传统民居象征意义重构的价值。

上面我粗略地列举了赵巧艳《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一书中的几个显著的特点和优点，但绝非该书的全部。还要啰嗦几句的是，在象征研究方面，我们未知的东西还很多很多，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因为从远古时代就产生和积淀起来的象征，毕竟是今人难以完全理解的，更何况象征还会随着社会和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而不研究、不了解象征，几乎就无法了解民族文化，也就无法了解一个民族的神话、巫术、艺术、仪式、梦幻、观念，甚至语言等人类的诸种文化现象。

赵巧艳是我在中南民族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她勤奋刻苦，敏于思索。2010年，在其写作博士论文时接触到了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并阅读了大量象征人类学方面的书籍。她的博士论文《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从符号学、象征人类学、宗教学、建筑学、民俗学等角度，重点阐释了侗族传统民居文化的仪式象征、空间象征、符号象征、观念意象，就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其中许多论断反映了作者缜密的思考和理性的概括。这是她第一部独立完成的著作，作为学界新人，其严谨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人类学研究》的出版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它对我国象征文化特别是建筑象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观点，可供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参考。

是为序。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前 言

民居（俗谓家屋）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建构，阐释其物质表象背后的丰富隐义早已成为一种良好的学术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的解释方法，学术界从象征人类学的视角解读民居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已取得丰硕成果，并且在民居的文化内涵、空间布局与空间意义、建造仪式、象征符号等内容的阐释上都有了较好进展。可是现有关于民居文化意义的研究对象仍然不够全面，研究范畴局限于民居中单个或某一类组成部分或构件，理论深度、研究方法与调查基础也相对薄弱，而且存在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看重民居文化的现代应用价值却忽视民居文化演进脉络的深度挖掘，从而限制了在整体与宏观层面深刻把握民居建造与使用背后的文化逻辑，以及民居演进与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以侗族传统民居的文化阐释为切入点，选择侗族传统民居从建造到使用全过程所隐含的象征表达作为研究内容，采用象征人类学研究范式与分析框架，通过对核心田野点——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龙胜县）乐江乡宝赠村的深入调查，以及其他侗族聚居区的广泛考察，分别从建造仪式、空间格局、象征符号、象征秩序和观念意象等多个层面，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侗族传统民居表征空间形成的实践脉络，以及民居空间意义的表征方式，并在最后反思了现代背景下侗族民居空间文化表征的演化趋势与重构价值。本书的逻辑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十个部分。

导论部分为后续内容的展开提供引导，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对象、借鉴理论、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等内容，对书中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辨析，并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田野调查经历。

第一章是国内外研究回顾与文献综述。分别从象征人类学、符号学、空间与家屋、侗族传统民居四个方面，对与本书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与概括提炼，既可以作为研究必要性与重要性的一个基础，也可以视为研究对象选择与研究内容确定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支持，从而为后面的研究内容展开与逻辑框架构建提供理论铺垫。同时，本章的内容也具有承上启下和抛砖引玉的作用，

为后续研究主题的展开提供相互关联的逻辑主线。

第二章是宝赠侗族传统民居概述。通过对宝赠侗族聚落与传统民居的介绍，详细阐述了宝赠侗族的村落概况与聚落模式、村落布局与居住格局、民居类型与建筑形式等内容。通过本章的介绍与分析，可以大致对侗族传统民居的物质形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为后面不同角度的传统民居象征人类学解读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与现实支持。

第三章是建造仪式与象征表达。首先对宝赠侗族传统民居建造过程及其当中的仪式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而且将建造仪式过程中最具特色的上梁仪式单独抽出进行全面描述，并简要探讨了其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然后借鉴仪式过程理论，深入阐释了仪式背后隐含的深厚而丰富的象征意义。分析发现，就整个传统民居建造仪式而言，“分隔—阈限—聚合”的经典演进路径依然存在，然而其中也包括了两个类阈限状态和一个以上梁庆典作为表达形式的阈限嵌套过程，而且所有的这些阶段性仪式过程其目的都是一致的。之后还着重探讨了仪式过程中阈限阶段的共睦态，以及仪式场域中所蕴含的结构隐喻。本章的分析不仅将现有仪式象征研究中以人为焦点对象的探讨拓展到了物的分析范畴，而且对仪式过程理论的实践解释与应用也起到了一定的深化作用。

第四章是家屋格局与象征蕴义。在详细描述宝赠侗族传统民居空间布局的基础上，以独立式家屋为例，对家屋中四种主要的空间区隔及空间意义的传递进行了深入解读。研究表明，宝赠侗族独立式传统家屋中，存在四个最为重要的细分空间——堂屋、伙房、主屋和谷仓，不同的细分空间传递了构成家屋空间的不同功能意蕴，而且每一个细分空间都藉由一个物质性的意义媒介物（分别对应为神龛、火塘、主床、糯谷）来实现空间意义的传递，并最终依靠它们分别表达的空间意义（共魂、共食、共居、共财），完整地体现了家屋的物质与精神内涵。

第五章是民居建筑与符号象征。在比较现有象征符号分类理论上，提炼出适合侗族传统民居的三类象征符号——关键性、工具性和指涉性象征符号，并对不同类型符号的象征意义进行了深入阐释。具体到宝赠侗族传统民居上，属于关键性象征符号的只有宝梁一种；体现工具性象征符号内涵的有四种——中柱、瓜柱、大门和主门；可以归入指涉性象征符号范畴的也有三种，即数字、语言（包括文字）和色彩。进一步分析表明，宝梁的象征意义涵盖了福、禄、寿、喜、财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中柱体现为家屋支撑与神佑象征；瓜柱借用葫芦来传递对家屋多子的祈盼；大门表达了主人对家屋招财、聚气和得风的愿望；主门则凸显了对家屋人丁兴旺的祈望。不同种类、不同含义指涉性象征符号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侗族传统民居的物质与精神内涵，也使得民居建造的意义更加完整。

第六章是二元对立与秩序象征。分别从对立产生的秩序根源、秩序的象征表达

形式和秩序的维持三个角度，得出由洁净与肮脏二元对立表征的三个秩序空间形式，即宗教活动、仪式空间和世俗生活，以及为了维持这种秩序结构而采取的两种常见手段——设立禁忌规则和对污秽进行净化。然后以此为基础，分别从上述空间视角，详细阐释了宝赠侗族传统民居建造与使用上洁净与肮脏两种不同秩序体系的物质与精神构建、秩序体系的维持与秩序规则遭到破坏后的补救措施。分析显示，无论哪一种空间类型，都存在与洁净和肮脏二元对立相似的象征表达，表达了不同空间对秩序维持与观念强化的目标追求。然而，无论洁净与肮脏的区隔界限、行为规则如何严格，对秩序的威胁和破坏总是难以避免，因此，建立针对污染和危机的化解原则及行动方案，对维护秩序结构的稳定性同样不可或缺。具体到宝赠侗族传统民居上，也有两种常用的秩序重构方式——净化和禳解，前者起到预防污染和化解危机两种功效；而后者则通过安神和除祟两种不同方式起到危机消解的作用。

第七章是象征渊源与观念意象。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系统总结和概括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渊源与观念意象。结果表明，宝赠侗族传统民居的象征表达既吸收了汉族的风水五行和阴阳八卦思想，也秉承了侗族传统文化中的诗性智慧和巫术信仰精髓，并在长期的采借与融合过程中演化出丰富的象征意义。对宝赠侗族来说，传统民居象征意义的表达虽然有多种媒介，如空间结构、建造仪式、符号使用等，可是如果从整体上考察，民居中传递的象征内涵事实上可以归纳为一个观念体系，它涵括了宝赠侗族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空间观、时间观、宗教观、阶序观、伦理观、生育观和幸福观等八种观念意象，而且每一种观念意象也分别能够从传统民居的物质、仪式、使用规范等方面找到对应的传递媒介。它们与民居建造和使用上的宗教—巫术仪式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宝赠侗族的整体幸福观念表达图式。

结语部分从实践的层面提炼上述不同视角有关侗族传统民居象征意义阐释的主要结论。指出侗族传统民居是实践基础上的一个表征空间，民居空间意义的形成与演化是实践基础上文化建构的结果。在意义的形成过程中，仪式实践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其他象征要素如亲属实践、符号实践和秩序实践等也有重要的贡献，而且总体来说，这些象征要素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侗族整体的幸福观念表达。

最后是余论部分。结合前述内容，探讨在文化涵化与政府政策双重作用下侗族民居的现代变迁，以及民居象征意涵消褪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并反思现代语境下侗族民居象征意义重构的价值所在。

作为民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传统民居是社会文化实践的场域，因而传统民居的物质表象背后，普遍隐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并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侗族传统民居就是这样一个载体。本书以宝赠为田野点，揭示了侗族传统民居背后的深层次文化逻辑及其表征方式。从民居建造过程和使用方式来看，侗族传统民居并不冗长和复杂，可是几乎在每一个操作步骤、物质准备和行为规范

上都蕴含着深厚的象征意义，并且由人及屋、由屋及寨，经过民居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很好地诠释了侗族文化传统上“人—家—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及其互动影响。也正是藉由这种联系与互动过程，侗族文化中别具一格的自然、宗教、伦理等观念得以呈现和强化，并逐渐上升为本民族共同遵守的行动逻辑和集体意识。尽管传统民居提供了了解侗族传统文化的一个良好窗口，然而作为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传统民居的变迁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自然逻辑和文化结果，而且变迁的总体趋势是民居的实用功能增强而象征意蕴弱化。这种变迁有其积极的一面，可是消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侗族而言，文化涵化和政府政策的双重作用严重压缩了民居中象征意义的生存空间，并已威胁到民族文化遗产与弘扬的前景。因此，探索高效可行的侗族民居文化保护与实施策略，重构时代语境下侗族民居的象征内涵更加意义重大。

Preface

Folk house (usually named as dwelling) is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abundant implicit meaning behind its material representation has become a good academic tradition. As a cultural explanation approach, interpreting the cultural meaning entailed in folk hou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has achieved plenteous result in academic domain, and the studi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spatial meaning, construction ritual and symbolic signs of folk house have got great progress as well. However, the extant researches o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folk house are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defects can also find in study category, theoretical depth, study methods and survey foundation. Furthermore, the present researches show the inclination of emphasizing application but neglecting theory construction. Most of researches mainly focused on modern practicing value of dwelling culture instead of deep exploitation of its evolution paths. Therefore, the systematic and macro – level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logic behind the building and using of folk house are limited, so as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welling evolution and change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 This book selects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Dong nationality as a cutting point, taking connotative symbolic expressions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from building to utilizing of traditional Dong dwellings as analyzing content. Through the adoption of symbolic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 and analyze frame, and deep investigation of the core field site of this research – Baozeng village, Lejiang town, Longsheng county, Guilin city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ombined with broad survey of other residing areas of Dong nationality, the dissertation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ed the practical forming approaches of representational space of traditional Dong folk house, and the means of representation of dwelling space from multi – viewpoints of building ritual, spatial structure, symbolic sign, symbolic order, origin of symbol and conception image. In the last, the book reflects the evolving trends and reconstruction value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Dong dwelling space under modern background. The logic frame of the dissertation mainly include following ten segments.

Introduction is a segment to provide pilot for following continuous parts. This segment mainly includes the description of background, meaning, object, referring theories, methods and innovations of the book. The discrimination of key concepts and fielding experiences are also detailedly discussed in this part.

Chapter one is literal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es domestic and abroad.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combed and extracted researches status in quo and progresses relevant to the theme of dissertation from aspects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semiotics, space and dwelling, traditional Dong houses respectively. This chapter, on one side, can be looked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other side, it can also be viewed as a theoretic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ing object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researching content. Thus provide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xtending of researching cont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logic frame for following parts. Meanwhile, the content of this chapter enact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and affording interconnecting logic clues for researching themes choosing afterwards.

Chapter two i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Dong nationality in Baozeng. Through penetrating and tho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chapter describes in detail several relevant aspects of Dong dwellings in Baozeng, including general situation and settlement pattern, village distribution and dwelling structure, housing type and building form. According to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chapter, a rough and comprehensive concept about the material shape of traditional Dong folk houses can be formed, which can provide a concrete practice foundation and realistic support for symbolic anthropologic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Dong dwellings from different angle of view in latter segments.

Chapter three is building rituals and symbol expression. At first, the author thoroughly describes the building process of traditional Dong folk houses in Baozeng and ritual activities among this proces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he most featured segment of building rituals - beam fixing ceremony (上梁庆典) is extracted and discussed in a separated section,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his ritual process was also briefly discussed as well. Then, with reference to the theory of ritual process, the chapter detailedly interpreted the profound and abundant symbolic meanings hindered behind these rites. The result indicates, for the whole rituals of dwelling building, a classic evolving path of ritual process, which is "separation - liminaires - aggregation" still exists, but it also includes two limiloid phases and an embedded process of liminaires that characterized by beam fixing ceremony, and all of those staged ritual process have a coherent purpose. After that, the chapter mainly dis-

cussed the situation of *communitas* in phase of liminares of the ritual process, as well as the structural metaphor contained in ritual field. The analysis of this chapter not only extended the human – focused discussion in current ritual symbolic studies to the category of material, and in some extent, it also deepened the practical expla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ritual process.

Chapter four is house structure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Taking unattached dwelling as examples, this chapter thoroughly interprets four key space separations and expression of their spatial significances inside the house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Dong housing in Baozeng. The findings show, there are four most important sub – space in traditional Dong folk houses of Baozeng – main room (堂屋), kitchen (伙房), principal bedroom (主屋) and barn (谷仓). Different sub – space expresses divers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that composed a whole dwelling space, and each of them realized its space significance via a material meaning agent (namely shrine, fireplace, main bed and *nuogu* correspondingly). Ultimately, relying on its individual expression of spatial significance of these for sub – space (spiritual sharing, feeding sharing, living sharing and fortune sharing), an integrative embodiment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a house was visualized.

Chapter five is folk house and the symbolic means of signs. Based on comparison of current theory of symbolic signs categorization, this chapter epurates three symbolic signs which suitable for traditional Dong folk houses – key, instrumental and referential symbolic signs, and in – depth interpretation of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signs are also discussed. Concreting to traditional Dong dwellings in Baozeng, there are one key symbolic sign — the beam (宝梁); four instrumental symbolic signs – central pillar, side pillar (or *Guazhu*, 瓜柱), main door and living room door; and three referential symbolic signs – numbers, language (including words), and colors. Penetrating anatomy of the above symbolic signs reveals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beam covers five aspects of contents, which are blessing, government official, longevity, happiness and fortune. Central pillar embodied as housing bearing and god blessing, main door expressed the owner' s wishes for accumulation of fortune, air and wind, while the door of main bed room emphasized a good desire for endless stream of people in the house. Diverse type and meaning of referential symbolic signs can not only enrich and fulfill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Dong folk houses, but also have contributions to make the building of a house more integrative and significant.

Chapter six is binary opposition and order symbol. From three angles of order origin of

binary opposition, expressing forms of order symbol and order maintenance, this chapter extracts three exterior spatial order forms of binary opposition in traditional Dong dwellings in Baozeng, which are religious activity, ritual space and mundane living. And two general methods to maintain this order structure - establishing taboo rules and the dirtiness purification. Then taking this as basis, from the above space angles, thoroughly explicate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struction of two different order system of purity and dirtiness, maintenance of order system, and remedying measures in case of system violation in building and using of traditional Dong folk houses in Baozeng.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no matter what kinds of space, there are similar symbol expressions to that of binary opposition of purity and dirtiness, and these expressions give out pursuance of variant space for order maintenance and concept intensification. However, contamination of categoriz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order are always an inevitable event regardless of how strict the limitation of categorization and behavior rule. Therefore,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order system,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ction to establish relevant solving principals and act schemes. Specific to traditional Dong dwelling in Baozeng, the scheme mainly includes two practical order reconstruction approaches - purification and exorcisement; the former plays two function of contamination prevention and crisis solution, while the latter aims to produce effect on crisis clearance via means of shrine resetting and ghost banishment.

Chapter seven is the origin of symbol and concept image.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systematically conclude and summarize the origin of symbol and concept image in traditional Dong folk houses. The analyz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symbol of Baozeng traditional Dong houses absorbed both the concept of geomantic omen and the five elements of metal prevailing in Han nationality, and inherited the kernel of poetic wisdom and witchcraft belief in traditional Dong culture. Through long-term experience of integration and learning, abundant symbolic significance were originated and evolved. For traditional Dong nationality in Baozeng, though there are many agent media for expressing the above significances, such as spatial structure, building rituals, signs application and so on, for a whole-level observation, symbolic connotation scattered out from traditional dwellings can be concluded into a concept system, which include eight concept image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of Baozeng Dong nationality - concept of nature, space, time, religion, hierarchy, ethnic, procreation and happiness. There are also corresponding agent media for each concept image that cover the aspects of material, rituals, utilize regulation, and etc. Combined with religion-witchcraft rituals in building and utilizing of folk houses, they composed an integrative conceptual expression of happiness for Dong nationality in Baozeng.